

90年代

●—周经 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

中国社会现象

①

- 中国在“扫黄”
- 住房改革：探索、希望与问题
- 一个个体户的事业与梦想
- 中国大学生面临职业选择
- 信访局：通达民意的渠道
- 中国服装追赶世界潮流



90年代：中国社会现象

周经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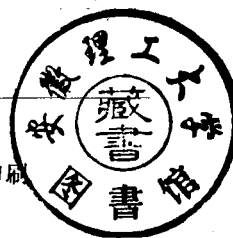
今日中国出版社

90年代：中国社会现象

周经 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6印张 14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72-0273-9 / C·1
定价：2.80元



目 录

北京兴起“卡拉OK”	[1]
上海：不夜之城	[2]
广州群众文化见闻	[3]
中国在“扫黄”	[6]
第三产业在中国兴起	[9]
中国的劳务市场	[13]
“第二职业热”在中国	[16]
共和国的普通人	[18]
一个个体户的事业与梦想	[19]
一个私营企业主的自述	[20]
过去的资本家在做什么？	[23]
中国服装追赶世界潮流	[25]
大男大女的婚姻问题	[29]
中国：清理违法婚姻	[32]
消费者权益受到保护	[34]
警告：烟害在中国	[37]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现状	[38]
住房改革：探索、希望与问题	[40]
商品房价过高	[43]
交通拥挤：北京的一大苦恼	[44]
中国农村探索新的养老方式	[46]
大学校园气象	[48]

大学生：课余去打工	[50]
大学生面临职业选择	[52]
留学归来之后	[54]
“性教育”：不再是禁区	[58]
“性教育”进入中学课堂	[60]
心理咨询在中国	[61]
北京的一家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64]
广告行业面临的问题	[65]
乞丐现象	[66]
“盲流”问题困扰社会	[67]
“安乐死”在中国悄悄进行	[68]
拉萨：市民心态	[69]
中国出现民间银行	[73]
试验：企业实行股份制	[75]
证券流通领域的改革	[77]
中国继续向外商敞开大门	[79]
信访局：通达民意的渠道	[81]
中国人民怎样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84]
居民委员会：市民的自治组织	[88]

北京兴起“卡拉OK”

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卡拉OK”在北京兴起，至1990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城办起了大约50家“卡拉OK”歌厅，为北京人比较单调的夜生活增添了一抹引人注目的色彩。

“卡拉OK”源于日本，“卡拉”是日语“空”的意思，“OK”是英语管弦乐队的简略音，“卡拉OK”意为无人伴奏乐队。它的历史至少有30年；近两年风行于香港地区、南朝鲜、新加坡，并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

入夜，喧闹了一天的北京城沉静下来，而这时大大小小的“卡拉OK”歌厅则亮起了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它们的营业时间大多在晚上8点至12点，周末延长一两个小时。歌厅里，客人们在流行音乐伴奏下当众演唱，歌唱爱好和表现欲望都得到满足，白天紧张的情绪也得以放松。除了唱歌，也有一段长时间跳舞，偶尔还有时装表演、抽奖等活动。

1989年9月开业的北京西城区的“四季卡拉OK”歌厅大概是全城上座率最高的一家歌厅了。这里平均每天都有八九成客人，有时甚至客满。歌厅设在淮阳春饭店3楼。光线昏暗的歌厅里，烛光点点，人们围坐在一张张长方形桌子前，或喝饮料，或交谈，或欣赏别人演唱，显得轻松自由而秩序井然。许多人从歌单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在点歌卡上填好曲名、桌号、姓名，标明是女士或先生，由服务员交给台上的主持人。主持人依先后顺序请客人上台演唱。歌声响起，清晰的彩电屏幕上出现了与歌曲内容相配合的图像和歌词提示，画面多是山水风光和一般的反映爱情的场面。当演唱的歌曲节奏较为激烈时，场内设置的宇宙灯、紫光灯、频

闪灯随之闪烁、旋转，令人眼花缭乱。几乎每位演唱者都能得到掌声。主持人是位能歌善舞的年轻女郎，她问或也唱上一曲，使全场气氛达到高潮。

记者与坐在对面的3位结伴同来的20多岁的小伙子攀谈起来。他们是北京汽车装饰制造厂的工人，家住在附近。他们说，过去晚上时间大多看电视、打牌、打台球，现在有了“卡拉OK”歌厅，来这里坐坐，觉得新鲜、愉快。一位名叫李宝坤的小伙子说：“我这是第二次进‘卡拉OK’歌厅。我喜欢音乐，但自己唱得不好，主要来听。”他指着他的同伴杨立军说：“他唱得不错，曾经在一个演唱培训班学习过。他是这里的常客。”杨立军此刻正等待着上台演唱。半小时后他如愿以偿，演唱了台湾电视连续剧《一剪梅》的主题歌。他唱的虽不像专业演员那么好，但歌声宏亮，举止大方，博得一片热情的掌声。

“四季卡拉OK”歌厅经理康杰原是马克西姆合资饭店的领班，去年辞职后承包了这个歌厅。“‘卡拉OK’热的出现说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以往单调的业余生活已不满足。”康杰说，“看到客人在这里玩得很尽兴，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大家的承认，心里很高兴。”

有些“卡拉OK”歌厅，如新近开业的美尼姆斯歌厅，可以为演唱者摄像，使他们的演唱形象显示在舞台后的屏幕上，有意者还可取得录像带作为纪念。

目前，北京的“卡拉OK”还是一种高消费娱乐形式，门票价格一般在20元—30元左右，约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入场后开销也很大。以“四季”歌

厅为例：一杯进口啤酒10元，可口可乐3元，苹果汁8元，一杯酒水最高可达70元，一盘去皮削好的西瓜20—40元，因此大多数市民仍不可能光顾。

最近，北京西城区有关部门曾对200名“卡拉OK”歌厅的顾客进行询问调查，发现各类公司、宾馆工作人员、个体户约占70%，其他人员30%；从年龄结构上看，21岁—30岁的占70%，31岁—40岁的占27%，40岁以上的占3%；从文化结构上看，大学学历的占16%，高中、中专学历的占60%，初中以下

的占24%；从地区上看，本市的占90%，外省市的占10%，港、澳、台同胞、外国人偶尔光顾。

北京的“卡拉OK”歌厅基本上都能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高雅文明的气氛，受到顾客普遍喜爱。但也曾出现过酗酒打架的事情。最近，有关部门对全市歌厅进行整顿，发布了《北京市歌厅管理暂行办法》，一些质量较差的歌厅被停业，这对提高歌厅普遍水平有一定作用。

(封 婧)

上海：不夜之城

上海，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其独特的都市魅力并不因夜晚的降临而消逝。除了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大世界”娱乐中心，一大批舞厅、音乐茶座、歌厅、“卡拉OK”和其它娱乐场所都能在晚间迎来营业的“黄金时刻”。

沿着外滩附近由霓虹彩灯辉映着的闹市街头漫步，或者走过深街小巷里的私人经营的小小娱乐场所，谁都会感到上海有别于其它中国城市的那种“不夜城”的特殊氛围。如果愿意，谁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场所使自己在业余时间充分地愉悦一番。

前一阶段在全国开展的“扫黄”和除“六害”活动并未给上海的文化事业造成任何消极影响。相反，该市的文化事业仍然十分繁荣，并且发展得更健康，更有条不紊。这是上海市文化局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的。

虽然上海的不少市民热衷于晚上在家打麻将取乐，但电影院和投影录像室仍然是外出约会的恋人们躲避冬夜严寒的最佳去处。新近译制的外国电影和录像片也依然是观众们喜爱的节目。

那位接待记者的文化官员认为，对娱乐、表演营业场所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按照扫黄的有关政策精神，上海已制定了一系列与文化市场管理有关的法规。随着这些法规的实施，原本处于自发状态而良莠不齐的娱乐业便经历了严格的清理整顿，现已纳入有效的管理轨道。

据该官员称，自1989年7月以来，市文化局已对全市所有的舞厅、音乐茶座、“卡拉OK”、业余乐队、时装表演及其它民间文艺团体的资格重新审核，责令69家舞厅和5家音乐茶座关闭。

该官员告诉记者，在全市现有的272家舞厅当中，有百分之六十的舞票只卖2元，仅百分之二是属高档，舞票在20元以上。上海已有“卡拉OK”33家，装备有最先进的激光视听设备；尽管对一般的市民来说“卡拉OK”仍是个新鲜玩艺儿，但可以肯定，它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滩。

“培训营业性娱乐业的从业人员也是十分重要的。”该文化官员说。经理、乐队成员、歌手、音响技术人员和时装模特等都应

熟悉有关的法规，具备本专业的基本知识。为此，有关部门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培训人员达3万人次。1800名乐手和歌手通过了专业考试并取得了证书。

该官员还告诉记者，市文化局和公安、工商管理局在管理文化市场过程中密切配合，携手合作，共同探讨和实践有关文化市场管理的理论和法规。最近，他们的工作重点将转向对游乐场、桌球和吸引了大批如痴如醉的青少年顾客的电子游戏机的管理。

在过去一年里风靡的“卡拉OK”不仅不会受到限制，还会得到鼓励，以使布局趋于合理。

除大众娱乐方式外，还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活动和推出了不少新的剧目。该文化官员说：“随着90年代的到来，我们将努力以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表现伟大时代精神为主旨，全力振兴民族文艺。”

事实上，有关的工作已经展开。目前，受朱镕基市长委托，由文化局长、电影明星孙滨带队，一支由著名演员、歌唱家、芭蕾舞演员组成的大型慰问演出团正在山西、内蒙、河北、北京等地作巡回演出，慰问当地煤矿、交通、运输系统的职工。演出的节目有京剧、越剧、沪剧、滑稽、杂技、音乐和

舞蹈等。

该官员还告诉记者，元旦、春节期间，上海总共上演67台剧(节)目，其中绝大部分为民族艺术作品，18台新剧(节)目是首次公演，其中包括上海民族乐团的《民乐名家专场》、上海舞剧团的《舞蹈明星专场》、上海乐团的专场音乐会以及几出新编越剧和沪剧剧目。

与此同时，11个外省市文艺演出团体也在佳节之际为上海观众献演。另外，若干演出队还将下乡、下厂、下工地、到军营和大学进行慰问演出。

作为上海发展都市文化的重要步骤之一，该市将创办两年一度的集过去“上海戏剧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于一体的“上海之春艺术节”。

新的艺术节自1990年春天开始，其间不仅推出上海自己的各类艺术展演、展览，还邀请外地和国外的艺术团体及艺术家前来参加。

上海文化部门还将在“上海之春艺术节”之后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包括开展“上海话剧发展战略对策”研讨活动。另一重大步骤是将“上海艺术剧场”正式定为中外艺术精品的专演剧场。(戴刚)

广州群众文化见闻

群众自娱自乐的曲艺社团

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广州一改白天人们行色匆匆和喧闹的气氛，显得轻松而悠闲。沿着古老的市井街道漫步，不时听到晚风中飘来的阵阵乐曲声。

我们循着乐曲声来到一栋旧式木结构楼房的二楼，只见墙上挂着一条横幅“和声音

乐社”，它是广州群众自发组织的业余民间音乐曲艺组织中最闻名的一个。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是粤剧粤曲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或在家庭、或在街头、乡间、空地，随处都可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我们坐定。屋里已有近20人。他们各自操着自己的乐器，正在演奏一首著名的广东民间音乐“雨打芭蕉”。乐曲演奏得韵味十足，每个人的神态亦是有滋有味。

这个乐社的社长冯国梁告诉我们，40年前，当他还在邮局里当邮件押运员时就牵头在自己的住处开始了业余演唱活动。开始时是以邮电职工为主要成员，后来逐渐扩大队伍，包括来自机关、工厂、商店、酒楼、学校的文艺活动骨干，以及从专业曲艺团退休的老行家。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强烈爱好使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活动。近年，他们还以曲会友，架起了与港澳粤乐曲艺交流的桥梁。香港、美国的一些粤乐名家都曾慕名到该社切磋交流或客串登台。在广州市第1届交流大赛中，他们夺得了唯一的优秀团队一等奖。

像这样的民间曲艺团体，在广州市约有近百个，其中有不少是以青年人为主的乐社。前几年当流行歌曲兴起时，广东曲艺曾受到很大的冲击，专业团队演出场次剧减，但业余粤剧却如同一块绿洲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生命力。这不仅是由于民族民间艺术深深植根于普通群众生活中，也由于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从1978年开始，广东省、广州市文化部门主办的曲艺创作、曲艺演唱评奖活动年年举行，从不间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青年表演艺术家。

“和声乐社”所在的荔湾区历来有广州“曲艺中心”的美誉。从1986年开始，该区每年举办一次民间曲艺交流大赛，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1989年10月广州市文化局倡议扩大其规模范围，共同举办了广州市第1届、荔湾区第4届广东民间音乐曲艺交流大赛，从参加初赛的80多个曲艺社团、1200多人的67个节目中评出18个乐社、300多人的36个曲目参加决赛。参赛者年龄从十几岁到70多岁不等。

音乐茶座和歌舞厅

与古朴的市井民居相对的是那一幢幢林立的酒店和灯火辉煌的歌舞厅。除了喜欢传统的娱乐方式外，相当一部分广州市民更愿

意在这里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夜生活。

一谈起这些，广州人总是掩饰不住他们的自豪：进入80年代，全国第一间音乐茶座、第一支歌舞厅轻音乐队、第一个营业性舞厅、第一座录像放映场以及桌球室、电子游戏室等几乎都是先在广州出现，并逐步向北扩散的。究其原因，一是广州商品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文化夜市的繁荣，二是广州邻近港澳，随着许多生意人的往来，外来影响随之而来。

位于广州市中心的广州文化假日酒店开业一年来，以其风格独特的“翡翠”迪斯科舞厅和“明星廊卡拉OK”而颇受青睐；不仅住在这里的客人，就连周围其它宾馆的客人以及广州市民也纷纷慕名前来。

当我们步入“明星廊卡拉OK”时，里面已座无虚席。台上，一位男青年正在以一首歌颂美好的青春时光的歌曲为他的女朋友的生日助兴。再看侧面墙上的点唱牌上的号码，后面已经有10多位歌迷正跃跃欲试着准备登台。一位刚刚走下歌台、仍带着一脸兴奋的小姐的话也许能代表在座的歌迷们的共同想法：“当你目视着镭射（激光）影碟显示出的图像和字幕，跟着音乐的节奏学唱选中的歌曲时，仿佛身后有整个乐队在为你伴奏。不入迷简直太难了。”

“翡翠迪斯科”舞厅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变幻旋转的光影里，一些衣着入时的青年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负责放音乐打灯光并制造气氛的音乐主持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这家酒店的副总经理袁德坡告诉我们，来这里的广州青年多是那些在外企或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工资一般相当于普通市民的2—3倍，所以60元人民币一张的门票对他们来说并非高不可攀。他们通常是在一个公司做事的同事，日间极度紧张，晚上便成群结队地来这里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晚上，求得放松。

假日酒店属于高消费娱乐场所，中华电影院舞厅则是普通市民的消遣天地。这里的

门票仅8元，约是高级舞厅的十分之一。一对对舞伴中有老人、青年，甚至小孩。他们在这里享受到了无拘无束的快乐。左侧的酒柜前，一对对情侣舒适地坐在高脚椅上，一边缓缓地品尝着饮料，一边享受着这热闹的气氛。一位机床厂的工人说：“我每周平均要在这里跳三个晚上，来‘中华’跳舞真是一身轻松。”难怪这里夜场总是爆满。

广州的音乐茶座(歌舞厅)是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崛起、适应社会的需求而自发地出现和发展的。所需资金都是社会各方自行筹集，国家不花分文。据统计，在广州2000多个文化娱乐场所中，国营的占14%，集体的占48%，个体的占37%，中外合营的占1%。

文化部门始终注意对音乐茶座进行积极引导。从1988年开始，广州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管理办公室就开展了广州市音乐茶座先进评比活动，提出“文明、高雅、舒适、安全”的目标。1989年被评为先进音乐茶座的单位都是由于他们坚持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大胆投资，不断完善和更新场地设施，提高服务水平，加强保安措施；在艺术上不断提高演出质量，以唱中国流行歌曲为主，并扩大大地区创作歌曲的比例，为建立音乐茶座自己的地区风格探索了新路；在节目编排上注意形式多样，既健康又有娱乐性。为了提高广州市音乐茶座演员的业务素质，社管办还举办了培训班，同时派演(奏)员到音乐学院深造。另一方面，广州市文化部门又通过“大家唱”、“十大歌星评选”、“茶座轻音乐队比赛”、“文明观众”、“文明娱乐场评选”等示范性活动，把群众的兴趣引到有益的文化娱乐上来，努力使广州的文化夜市始终健康地发展。

提高

表面看来，广州的文化夜市似乎是通俗音乐的一统天下，其实不然。广州市广东迎

宾馆榕荫阁歌舞厅内的一次活动使我们改变了看法。300多位听众安静地围坐在一张张圆桌旁，陶醉在美妙的乐曲之中。他们绝大部分是年青人，但却不是来听流行歌曲演唱的。这是广州《信息时报》音响专版的《视听世界》为纪念卡拉扬而举办的音乐欣赏会。由于所选用的音响器材比较高级，听众们欣赏到了近乎现场演奏效果的由卡拉扬指挥柏林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施特劳斯等大师们的杰作；并且会上还有专人讲解，帮助听众了解大师们的不同艺术风格、欣赏卡拉扬各个时期的指挥手法和特点，从而提高了听众们的音乐欣赏水平和对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在流行音乐颇为盛行的今天，这个讲座得到了热烈的反应，说明青年中有着一大批古典音乐的乐迷。

多功能电影剧院

为了适应群众文化活动的需要，广州市40多家专业影剧场从80年代初期开始纷纷因地制宜，按多功能的要求进行改造，开设了录像室、桌球、电子游戏机、舞厅、咖啡厅、音乐茶座等。影剧场本身也各显神通，为观众提供多层次的服务。如有的电影院专门放映探索片和有争议的影片，满足较高层次观众的要求。有的影院重点放映儿童影片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片、科教片，并上演儿童戏剧。有的电影院开展了通宵放映服务。蓓蕾剧院举办了近两年的“儿童电影小沙龙”活动。广州电影院举办了200多场以介绍和欣赏中外著名交响乐为主的“星期音乐欣赏会”。这些做法不仅深受市民欢迎，也使剧院的营业额大大增加了。

星罗棋布的书报摊

来广州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

广州街头的书报摊特别多，沿街走走，随处可见。据了解，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文化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有50多家书刊批发部和800多个零售书报摊；还有更多的未计入统计数字的流动售书者。

在1989年的扫除淫秽出版物的过程中，广州市曾对全市的书刊批发部和书报摊进行全面清理，共封存和收缴了13万册宣扬淫秽、色情、暴力的书刊和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出版物；重新整顿了出版、发行单位和印刷厂，对销售书报刊的集体单位和个体户摊档也重新审核，严禁无牌经营。

在广州街头一个流动书摊上，记者发现涉及养生方面的图书颇多，如介绍各种食谱、补品和锻炼方法的。还有一些港台言情小说。这位看来还只是个中学毕业生的年轻摊主说，这些书很好卖，所以他进货时总是偏重这方面的书。他说：“养生的书读者面广泛，男女老少都可以看。不少青年人则喜欢买言情小说。”另一位戴眼镜、颇有知识分子模样的摊主摆出的却是五花八门的讲成材之道的图书和刊载有关中国高级领导人传记的杂志，

他颇有几分自豪地说：“来我这里买书的人都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刚好一位青年挑好了两本书正准备付款，我看了一下书名，一本是《开放自我》，另一本是《自我实现的人》。这位读者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简单：“每当我看到这类书，我总觉得它们对我的一生都会有用，所以非要买了才安心。”这也许应该说是出于一种完善自己的本能吧。中外名人和领导者的传记也是很受读者喜爱的，如《亚科卡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年轻的父母则特别注意选择有益于提高智力的幼儿读物和如何优育的书籍。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表明：282份有效问卷反映的结果显示，90%的调查对象认为广州市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繁荣的书刊市场，88.7%的调查对象认为个体书摊的大量涌现方便了市民购书、丰富了文化市场，9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对图书发行部门进行清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重要的是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陆咏鸿 洪兰星）

中国在“扫黄”

中国的出版业自1979年改革以来发展很快。1988年，全国的502家出版社共出版了各类中外图书62962种，总印数达62.25亿册，这一年内还出版了总印数为25.5亿册的5865种各类杂志和总印数为267.8亿份的1537种报纸。拿这样的出版规模和改革前的十几年中低产的出版情况相比，一位普通读者、50来岁的银行职员游玉贞女士说，那时一年也读不到几本新书，现在书多得连书名都看不过来。

出版社的发展刺激了出版市场的兴旺，现在全国共有国营、集体、个体的书店2万多个，遍布城乡各地。中国的音像业是在这10

年里成长起来的。在1979年以前，中国还没有出版盒式磁带的厂家，更不用说生产录像带了。到了1989年，全国已有188家正式的音像出版机构和50多个音像带生产厂家，音像带的销售网也由城市向乡村发展。1988年，全国共销出了36万盘录像带、1.17亿盒录音带。此外，还有3万多个录像放映点活跃在大、小城镇，为群众播放录像节目。

黄色瘟疫

与此同时，从1984年起宣扬淫秽、色情、

暴力和迷信的出版物趁出版管理和文化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的时候，大量流入了出版市场。《肉蒲团》是中国的一本遭禁了300年的描写性乱的淫书，《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是60、7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暗中流传的一本淫书，这些书在前一阶段的书摊上竟也能够找到。1989年1月，新闻出版署公布了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各地据此立即确认的淫坏书籍至少就有254种。在录像带市场和一些放映点，不少从非法渠道入境的淫秽录像带及其复制品被公开或半公开地出售或播映。福建省公安厅的资料表明：1988年该省的走私淫秽录像带有411种，1989年上半年又增加了66种。这些录像带在西方也是受限制乃至禁止的，其中一些甚至赤裸裸地表现同性恋和人兽性交行为。

1989年7月份，记者在北京一家个体书摊上看到一些政府明令禁止的书仍在销售。年轻的摊主说，市场管理人员管不了这么多摊点，就算他们来了，被查出来，大不了也就罚几个钱了事，还没赚的多呢。这位摊主只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书刊、音像经营人中最普通的一个。这几年，他们迎合了一大批文化素质不高的读者、观众的低级趣味，谋制了大量黄色出版物在社会上贩卖、播映以牟取暴利。这些不法出版物经营人组织起了一个地下出版发行销售的网络，非法编辑、印刷发行书刊。中国东部沿海的某些地方成了黄色物品的集散地或集中制造地。在福建省石狮市，贩卖淫秽录像几乎是公开的，一些贩子一见外地人就围上去兜售。这里与海外的往来频繁，淫秽录像带多是从海外非法带进来后复制出售的。在复制、贩卖淫秽录像最猖獗的时候，有近1000家个体户兼营这项非法营生，每天至少生产3300盒淫秽色情录像带，品种约500个。上海市这两年查获的淫秽录像带3/4来自石狮市。

黄色制品的另一个源头浙江省温州市的金乡镇从1989年3月到7月，有77家个体户和

私营企业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发出了100万封录像带征订函，函中公然重点注明了淫秽片，结果收款总额达72万元。

黄毒危害

在强奸了4个少女的陈秉勋被逮捕以前，他的身为教师的父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独生子竟会沦落为罪犯。他们自信家教是严格的。确实，陈曾经是福建省晋江县一所中学里的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他15岁上高二时，背着教师家长借来了《少女之心》。这本淫书使他着了迷，通宵达旦读完了不算，还全给抄了下来。自此以后他又看了不少坏书和淫秽录像，结果被勾起的邪念不仅使他的学习大幅度退步，更使他刚刚16岁就锒铛入狱。

在陈被关押的福建省第一少年管教所里，所有犯性罪错的少年犯和少年教养人员，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乡村的，都和陈一样看过黄色的书、刊、画片或录像，80%是直接受其影响而犯罪的。

即使没有走上犯罪道路，大多数看了黄色出版物的青少年也变得放松学业、不求上进。北京市的一位中学教师所教的班级原来是一个先进班级，黄色书刊在班上流传后，男、女孩子们变得语言不文明、行为下流、追求享受、无心读书，风气越来越坏，一年内竟有4人留级、1人犯罪，学习成绩普遍下降。她感叹道，教师、家长们苦口婆心地教孩子们作好人，有时一本坏书就使前功尽弃，真是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一位学生家长说，过去担心孩子不读书，现在坏书太多了，又害怕孩子读书。

事实上，黄色出版物并不止于危害青少年。北京市有一位30岁的男子，已成家有了孩子，在看了淫秽录像后竟也迅速堕落，纠集了一帮人搞淫乱活动。

面对黄毒泛滥，社会各界都大声呼吁彻

底扫黄。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关涛说，广大母亲早就忧心忡忡，她们期待着扫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说，黄色书刊、音像制品已成了诱发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非扫除不可。早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六届3次会议上，就有67位委员提了7份提案呼吁取缔不健康的小报书刊。从那以后，清理、查禁黄色淫秽书刊、音像制品就成了政协会议一个“长久的议题”。终于，人们迎来了这次全国大扫黄。

扫除黄货

自从新闻出版署1989年7月11日下发了《关于检查整顿书刊市场的紧急通知》，特别是198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的会议之后，各地都相继进行了突击清查文化市场的活动。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突击的方法，新闻出版署负责扫黄的官员黄晓新说：“因为这几年出版市场积累了不少问题，各类黄色物品很多，只有集中清理才有利于迅速改变面貌。”截止1989年9月底，全国共收缴封存了黄色书刊5000多万册、录音录像带40多万盒。群众普遍反映，大清查之后的文化市场干净多了。

各地在突击清理中都强调了严格掌握政策。很多地方是先调查开出了违禁出版物的目录，然后按图索骥进行检查的。认定出版物性质的权限被严格限定在国家和省两级书报刊和音像主管部门，只有由聘请来的专家组成的审读班子才能决定一本书是不是黄色或淫秽书。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尤其是黄色出版物泛滥比较严重的沿海一些地区都确定了扫黄重点。这些地区的公检法、新闻、出版、文化、工商、民政、卫生、交通运输、邮电、海关等部门既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运用教育的、纪律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福建省的交通、邮电单位对发白石狮市的货物、邮包进行了严格检查。福州机场的工作人员在货检中发现了由一个石狮人非法托运准备发往13个省、市的淫秽录像带近万盒；邻近石狮的同安县一所邮局查扣了另两个石狮人贿赂该邮局的两名工作人员向外邮寄的淫秽录像带；石狮市的货运点中有43个因经办黄色物品被查封。除从外围截住发往各地的黄色物品外，为了制止黄毒的蔓延，还在黄源所在地内部重点追查、铲除制作贩卖黄色书刊、录像的窝点。福建省派了一支以公安人员为主的扫黄工作队进驻石狮，和当地的公安部门一起查破制黄、贩黄的案件。充分发动群众是查出黄色窝点的有效办法。石狮市有50多个制黄、贩黄窝点在群众的揭发下曝了光。该市祥芝乡供销社的地下印刷厂便是其中之一。当公安人员接到举报迅速赶到这个厂时，装在机器上的8张淫秽画面软片还未取下，当场查出的还有淫秽书1万余册、淫秽挂历2万本，非法录像带的彩色封套15000张，19名人犯被捕。

大规模的扫黄行动使一些不法分子受到震慑，主动投案。石狮市的一个不法分子带着350盒淫秽录像带到检察院自首。该市的13家联运站主动把顾客托运的淫秽物品上交工商部门。浙江省的温州市有59人到政法部门自首。政法机关对投案自首的人实行了宽大。

各地查堵黄源的工作还落实在打击走私和整顿印刷、出版、批发环节上。以工作严谨闻名的厦门海关从1988年到1989年查出并处罚了走私夹带黄色物品入境约40人次。该海关还和有关部门合作，查出了一位新加坡商人夹带黄色录像带入境并在境内组织一伙人大量复制、销售的案件。在1989年下半年对报刊、出版社、印刷厂进行的整顿中，一些单位因为刊登、出版、印造了黄色和淫秽作品而被停业。

清理市场和查堵黄源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扫黄不可能毕功于一役。为了巩固和发

展成果，不再让黄色物品毒害人们，中央和地方都正在进行完善出版和社会文化市场管理制度的工作。

首先是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定严格的政策。1989年12月5日，上海市率先颁布了第一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专门的扫黄法规——《上海市查禁有害出版物暂行规定》。这项法规明确规定了有害出版物的鉴定标准，对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出版物都做了科学、明确的界定，还对如何处罚制作、贩卖(运)、出租、传播有害出版物者做了具体规定，使该地区的扫黄运动有了法规的依据和指导。北京、天津、山东、浙江等地也已经或正在制定关于出版的法规和关于社会文化市场管理的法规。

其次，各地都建立了权威的社会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充实了管理人员。浙江省的许多市、县(区)设立了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北京各街道建立了日常的书刊市场管理小组，使书刊市场管理工作在该市各区形成了网络。在成都市，从1989年的8月23日起，一些经过政策培训的书刊市场稽查人员活跃在各个书刊市场上，半个月內便收缴明令查禁书刊8428册，取缔地下批发书店一个，查处出租淫秽书刊的租书店2户。

繁荣文艺

在扫黄工作中，人们认识到，要清除不健康的、淫秽的东西，不让它流传，除了打击、取缔外，还必须用健康的作品来满足群

众的需要。领导中国扫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说，“扫黄”的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扫黄之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上海、福建、吉林、江苏、广东分别举办了大型书市和图书展览，向广大读者推荐、提供健康有益的读物。许多省市也已采取措施，扶持健康作品。陕西省决定将全部扫黄罚款及没收款作为健康读物和学术出版基金。上海市也设立了鼓励对象相同的出版基金500万元。河北省试行了对不同类别的图书实行不同税收的办法，以限制艺术价值不高的书籍和鼓励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书籍出版。中央有关部门也正在拟定相同的办法。1989年10月20日，在北京的一个展览馆举办了第3届国际音乐音像制品展销会，15000多种音乐唱片、磁带、激光唱片、录像带和激光视盘组成了一个多彩的声像世界。这次由美国、日本、苏联和香港、台湾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出版公司参加的展销会强烈地吸引了中国的音乐爱好者，也表明了中国政府不会因扫黄而削弱对外文化交流。相反，如李瑞环所说，治理好的文化环境更有利于健康的文化交流。对于前一时期黄色作品泛滥时流传的一些境外的文化糟粕，中国文化部的说法是，那些都是从不正当的渠道渗透进来的，而不是从正式的文化交流渠道交流进来的。其中一些甚至是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反对的并在西方也遭限制或禁止的。中国愿意把世界上先进文化和优秀的文化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同样，也反对那些在世界范围的扫黄中遭唾弃的东西毒害中国人民。(程刚)

第三产业在中国兴起

在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新设置的一个电脑问路亭吸引了一群人。问路者只要把一枚5分硬币投入机器内，便能在屏

幕上看到自己所要的最佳乘车路线，并得到一张指路条。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妇女说：“这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太方便了。”

目前,这种电脑问路亭只在北京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才能见到,对于一向落后的公共服务设施来说,它不过是一些点缀而已。但是,它的出现却象征着长期被忽视的第三产业正在兴起。这里也伴随着人们认识上的转变。

认同但有区别

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是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阿·费希尔提出的,50多年来已被国际间普遍采用。三次产业的划分是分析现代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一种科学方法。第三产业的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然而,在中国的一段长时期内,第三产业的概念不被承认。尽管各种服务行业早已存在,50年代前期还有不小发展,人们在理论上还是一直认为劳务服务不创造价值,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产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

关于第三产业的讨论最早见诸中国报刊是在80年代初。赞成者的理由是,服务业也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某种使用价值,或者为实现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劳动,理应得到承认并计算产值;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同国外经济的发展状况作比较。反对者的理由是,服务业并没有直接提供物质产品,它只是依附于物质生产部门而存在;他们认为,第三产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提法不符。当时,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没有取得一致。

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赞同采用第三产业的观点越来越占上风,1984年国务院决策加以肯定。1985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并首次公布了中国当年第三产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

关于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各国不尽相

同。根据中国的国情,现已采取的划分办法是:

第一产业为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为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是上述以外的其它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

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技、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警察等。

目前,中国只采用上述第一、第二、第三层次计算第三产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第四层次只计就业人数,仍不计算产值。

至于国外第三产业中包含的某些腐朽行业,如妓院、赌场等,在中国既不存在,也将不允许存在,当然不包括在内。

曲折的历程

按照现行统计口径,根据以往有关统计资料加以推算,可以看出中国第三产业30多年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致说来,50年代前期情况较好,第三产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27%。1957-1980年,它的比重逐渐下降到20%以下。不是因为需求

减少，而是由于人为因素所致。

首先，指导思想上就忽视服务业，很少投资。这当然和前面提到的否认劳务服务是生产性劳动的认识有关。其次，生产资料公有化搞过了头，许多从事服务业的集体企业被兼并，剩下少数个体经营户在“文化革命”中也几乎一扫而光，致使服务行业的网点大量减少。第三，服务人员的收入和待遇比一般生产工人、农民低，积极性不高，服务质量也差。因此，购物难、就餐难、住宿难、行路难、理发难、洗澡难成为城市里普遍而突出的社会问题。

1980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降到谷底——18.7%，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1%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29%的水平。这种由指导失误而造成的紧张、失调现象该结束了。

人们盼望已久的转机终于到来。在第六个5年计划期间(1981年——1985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出现了比第一、第二产业增长更快的趋势。1985年，第三产业产值达到1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7%，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回升到21.3%，这是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而实现的。

一是国家大幅度地增加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1985年达570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51%，比1950年—1980年的年平均数增加了19个百分点，使城市基础设施和各种公共服务设施有了改善。

二是鼓励向第三产业就业，尤其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兴办第三产业。1980年以来，城市新生劳动力和第一、第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已转入第三产业。1985年，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达7365万人，使占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由1980年的11%提高到15%；在第三产业中，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由1980年的38%提高到58%。

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为例，1985年全国拥有1114.5万个机构(或单位)，为1980年的4.7倍；拥有3138万名职工，为1980年的2.2倍。

三是在价格改革中，适当调高了劳务服务的价格，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与第一、第二产业大致趋向平衡。

现在，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金融业这4个传统行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它们的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分别占第三产业的75%和61%。同时，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旅游等新兴行业也已涌现，并在迅速发展中。

需求与政策

专家们认为，振兴第三产业的主要动力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第三产业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需求，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灵活多样的政策措施。我在北京采访中获得的印象也证实了这一点。

座落在北京三里河的京华自选商场，是北京近年来兴办的数十家自选商场中较有吸引力的一家。每天，这里的顾客川流不息。三里河是政府机关干部聚居区之一，有较强的购买力。

30岁的总经理黄成宪说：“我们这里主要经营食品、饮料、蔬菜、水果、日用小商品等，共3700多种。其中，市面上比较紧缺的高档水产品、禽类平时达到40多种，节假日达60多种，很受欢迎。甚至有些住在城东和郊区的顾客也来选购。一位住在郊区丰台的老师，因为她母亲喜欢吃白糖鸡爪，每星期都来这里买鸡爪。”

虽然自选商场在北京还是少数，商品标价较高一点，但是却为居民们带来了方便。最主要的是在这里购物可避免排队时间。

我社日籍专家立花丈平说：“到中国的银行去换外币，简直太困难了。排队等候，手续繁杂，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银行的技术手段日前还十分落后，基本上是手工操作。虽然许多银行配备了点钞机，但往往抓不起旧钞或出差错，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宁愿用手点钞，而业务量却在不断增加。

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说：“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增加业务项目，为人民提供方便。现在为储蓄户服务的项目除了定、活存款外，已增加了定活两便、异地存取、个人支票、个人信用卡等项目。此外，银行贷款也将由单一的信用形式改为多种方式的信用体系，如票据贴现、抵押贷款、票据再贴现等。同时，加强各银行之间的联系，使现有的资金更好地利用起来。”

中国城市居民迄今大都还没沐浴设备，洗澡得去公共浴池。但是那里往往人满为患，要排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北京有一家浴池，因为污水处理问题被迫与环境保护局打官司。奇怪的是，这家浴池所期待的是输，而不是赢。如果输了，它可以改行，经营别的项目；因为洗澡收费太低，没有赢利甚至亏本，工作人员既辛苦，收入又少，不愿意干。如果赢了，它就必须继续经营浴池；因为市政府有规定，现有浴池一般不得停业或转为经营其它。调高了洗澡收费标准，才使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中国目前还远没有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繁琐的家务劳动耗费了人们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一位30多岁的妇女说：“我每天下班后，要买菜、做饭、洗衣、带孩子，根本没时间看书、学习或参加社交活动。我期待着社会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使我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这是近几年来大城市保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据报道，仅从安徽省无为县一地到北京来当保姆的，就有1万多人。可是，有

条件雇保姆的人家毕竟还是少数。因此，对于那些一般收入的家庭来说，还是更欢迎各种加工食品、方便食品以及托儿所。

在北京，我曾在一家个体饭馆吃过豆腐脑。那里的传统风味炒肝也吸引了许多人。经理翟小岩是辞退了原来的工作后开办这个饭馆的。她告诉我，她之所以下决心开饭馆是受了父母很大的影响的。她父母都从事外贸工作，常有机会到国外去，回来后讲一些国外见闻。她父母认为开餐馆也是一种职业，支持她这样做。

翟小岩说：“我喜欢这个工作，一方面为解决北京吃饭难的问题出了一份力，另一方面我又赚到了钱。”

也许，商业广告的兴起是最引人注目的了。每当电视屏幕上刚刚出现理光复印机的图象时，我的一岁半的女儿马上就会说“熊猫”，因为下一个镜头便是熊猫站在那里介绍复印机。1984年，有4000家中外公司在电视台做广告，比1982年增加了40倍。近几年，连乡镇企业的商品广告也在电视、广播、报刊和城市街头上出现了。

新兴的信息、咨询、综合技术服务业已有一些中心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大量涌现。1985年底，全国有科技和人材开发服务机构4600多个。仅上海、广州二市就已成立了400多家经济、科技管理、贸易等方面的咨询机构，从事咨询服务的人员达46000多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中国已不再是奢侈的享受。1985年，国内外的旅游者多达2.5亿多次。1981年—1985年，从海外来中国旅游、探亲和业务交流的人数达5585万人，平均每年递增25.6%。旅游外汇收入累计50亿美元，每年递增15.2%，成为中国非贸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有些地方服务质量差、收费过高、设施落后的问题仍需要努力改进。